

March 2013

The Education of Teachers of Chinese and the Spirit of University: On Xu Zhongyu's Literary Theory

Xiaoguang L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u, Xiaoguang. 2013. "The Education of Teachers of Chinese and the Spirit of University: On Xu Zhongyu's Literary Theor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2): pp.4-9.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2/18>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中文师范与大学精神

——徐中玉文论的独特内涵和启示

陆晓光

摘要:徐中玉文论的独特底蕴在于心系“师范教育”的民本思想。其显著表征首先是格外关切社会基层人才培养所特有的问题。徐中玉文论之所以进入《大学语文》领域,潜在原因是古典“师范”之义所蕴含和要求的大学之道。徐中玉文论思想连同其长久的语文师范教育生涯,有可能为当代中国大学精神提供不同于西方“normal school”传统的新启示。

关键词:徐中玉 师范教育 大学精神 民本文论 大学语文

作者简介:陆晓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美学、中日比较文学及古典诗学的研究。电子邮箱:lxgyabcd@hotmail.com

Title: The Education of Teachers of Chinese and the Spirit of University: On Prof. Xu Zhongyu's Literary Theory

Abstract: The uniqueness of Xu Zhongyu's literary theory lies in his people-oriented thought of "teacher education". The first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 is its concern with issues specific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grass-root talents. Xu Zhongyu's literary theory enters into the field of *College Chinese* because of the implicit reason that he reinterprets the classical meaning of "normal" to relate with the spirit of university. Xu Zhongyu's literary theory and his long career in Chinese normal education may provide new inspiration to establish the spirit of university different from Western concept of "normal" education.

Key words: Xu Zhongyu teacher education spirit of university people-oriented literary theory *College Chinese*

Author: Lu Xiaogua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Marx's aesthetics, classical poetics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lxgyabcd@hotmail.com

题 记

徐中玉先生今年九十七岁高龄了,中文师范教育生涯八十年。^①正值华东师范大学校庆六十年。2010年元旦,得奉新版《徐中玉文论自选集》,这是九十年代以来徐先生题赠学生的第三部《自选集》。^②

华东师范大学是“我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③笔者作为三十年前中文系文论专业毕业而留校继续学习并任教至今的学子,期以本文提交作业报告。

一、“师范教育”与民本文论

徐中玉作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的著名学者,其文论的独特底蕴和风貌特征首先在于心系“师范教育”。

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独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要任务为培养中小学教师,师范大学主要培养中学教师。^④二是政府资助并给予学生减免学费等优惠待遇。^⑤这两方面表征了现代民主理念的基本要求:大量培养教师是普及教育或开启民智所必需;减免学费则保障了贫寒子弟也可能享有高等教育。与此相应而众所周知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相对于其他著名大学,其六十年来的

历届学生生源较多来自社会基层。

《徐中玉文论自选集》明显区别于同专业其他文论著作处正是在于,格外关切社会基层生活与人才培养所特有的问题。这种关切是如此自觉持久而直言不讳,以至该《自选集》中几乎每一篇都可以读到通常可能被认为逸出“文论研究”范围的论述。鉴于这个特征迄今鲜为学界注意,下面略述若干片段:

1979年《发扬艺术民主,促进创作繁荣》:“群众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为了吃饭、谋生,每个人都得劳动,干个营生,总是有所专精。单独的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已经要比饱食终日的剥削者高明许多”(徐中玉,《徐中玉文论自选集》4)。因此,文艺领域中的专家学者们应该“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代言人,而不是群众的主人、‘下等人’头上的贵族”。

1983年《文须有益于天下——纪念顾炎武逝世三百周年》:“顾炎武文论就其中心思想来讲,无非要求人们写诗作文,一定要对广大穷苦百姓的命运,对政治改革,起有益作用”(27)。

1985年《中国文艺理论中的形象和形象思维问题》:“应该通过风雪花草之物的描写,对国家大事、生民疾苦,有所讽喻。有生动的形象,又有较深的寓意,作品才可能有较高的意境和境界”(239)。

1987年《重印〈刘熙载论艺六种〉序论》:“刘熙载文论的最可贵处在于,从‘吉凶与民同患’、‘己富而能济人之贫’的民本思想出发,提出‘代匹夫匹妇语’的文学主张,推重表现他们‘饥寒劳困之苦’的诗篇”(176-78)。

1992年《中国近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中,高度评价晚清一位学者文论中的“一个难得的卓见”,这个卓见是:“昔人称为文宜师圣贤,吾谓若吾人者,且师工农可也”(162)。

2001年《今天我们还能从〈论语〉择取到哪些教益》强调:孔子思想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的“民本、民生思想”方面。孔子所言“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表明他对底层劳动者相当敬重,“想不到距他两千五百年之后,我们敬称‘老农民’、‘老工人’、‘老师傅’之类,几与孔子的称法极其相像”(296)。

这里必须指出,徐中玉文论的一个早已众所周知的鲜明特征是坚持不懈批判极“左”思潮。

五十年代他缘此而被诬为“右派”,并被完全剥夺发表文章的权利整整20年。而在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时期所写的《古代文论中的“出入”说》中,他一方面反思:“相当长期以来,我们这里不少人把作家为劳动人民服务理解得太狭隘,太片面。他们以为为劳动人民服务,就一定要写劳动人民”(89)。另一方面在1980年发表的《言必中当世之过》中,他依然以苏轼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典范,强调关怀民生乃是中国文学批评不可或缺的重要尺度,“总的说来苏轼是苦口婆心,是想改善一点老百姓不幸处境的”(60)。

在中国当代文艺学领域,如此长久一贯地重视“民本、民生”,如此频繁执着地强调文艺家必须关注“广大穷苦百姓的命运”,《徐中玉文论自选集》至少堪称为数不多的代表性论著之一;就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界而言,管见所及,更可谓是罕见其类的唯一特例。

无论对徐中玉文论思想这一特征如何评价,它无疑比较切近学生来源多为贫寒家庭者的师范大学的教学语境。它与“师范教育”的基本理念和原初目标也是十分贴近:师范教育最初发端于民众教育,“民众教育是对大多数人民的教育”(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教育学家孟宪承语);而“大多数人民”无疑包括徐中玉文论所关注的“广大穷苦百姓”。如果说徐中玉文论的这一特征之所以较少受到文艺理论界的普遍注意,那么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师范大学”的特殊语境问题为非师范重点大学之学者们难以深切感触到。

然而徐先生文论的这一思想特征也是缘于他本人出身贫寒的艰难求学经历。从《自选集》可以读到作者自述:“家里没有一亩地、一间屋。母亲来自农家,不识字,父亲以中医为业,过的是清贫生活[……]”(徐中玉,《徐中玉自选集》1)。他早年读小学和初中是靠亲戚资助,读高中选择师范科是因为可以免费入学,读大学报考的是“比较省钱”的国立大学。“这种家境对我有深刻影响,我的人生道路就是这样开始一步步走出来的。”^⑥如果说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目前依然必须关注并承担落后、贫困地区的人才培养任务,那么徐中玉文论所蕴涵的独特关怀无疑不啻具有中文专业的“师范”之义。

二、古典“师范”与体贴励志

“师范学校”是现代汉语外来词,其西语语源“normal school”直译可为“平常学校”等。然而汉语“师范”早见于中国古典诗文,其本义是学习模范或师法典范。例如杨雄《法言·学行》:“师者,人之模范也”;《北史·杨播传论》:“恭德慎行,为世师范”;《全唐文》更有“耸动乎群伦,师范乎四方”、“想见高风,师范之尊”等。古代汉语“师范”之义提倡立志高远,向一流的前贤典范学习,这一重要内涵显然是近代西语“normal school”之类所没有的。并且,古典“师范”所推重的主要是诗文领域中的典范,尤其是集中表现于诗文作品中的人格典范。而徐中玉文论的思想资源主要是古典诗文,其《自选集》的另一显著特色正是继承发扬古典“师范”之义的人文教育。其中突出表现之一是向“人之模范”学习的励志教育。

例如《文须有益于天下》(1983年)中推重“民族志士顾炎武”(《徐中玉文论自选集》27);同年发表的《论顾炎武的文学思想》中,强调其人生最可贵处在于“志切兼济”,高度评赞其“虽然是‘穷而在下位者’,也应该负起庄严责任”(47)的文学主张。“立志”甚至直接作为徐中玉文论标题的关键词,《入门须正,立志要高》(1981年)认为:“这一传统的艺术创作经验对我们今天仍有用。我们‘正’是什么?‘高’在哪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谈‘正’谈‘高’,当然都离不开这根本的两条”(345)。显然可见,古典文论中的“立志”被提炼升华为现代中国师范教育的关键词与核心价值之所在。

然而徐中玉文论的“立志”教育并非空讲大道理,而具有师范教育的切实针对性。一般而言,“穷而在下位者”的切身问题首先是谋生。对于较多来自贫寒家庭的师范大学学子们而言,高远志向既可能成为激励其学习的动力,也可能事实上流于不切实际。换言之,“穷而在下位者”的学子们在高远志向与实际处境之间的选择,会面对不同于优裕家庭出身者的特殊困惑。因此,徐先生以拳拳之心而频频强调“立志高远”,至少意味着他殷切期待贫寒学子中也可能出凤凰。《重印〈刘熙载论艺六种〉序论》(1987年)再度阐释文学上的“师范”之义是:“志不在温饱”、“以天下为

己任”(177)。

然而徐先生也并非抽象一概地宣讲“以天下为己任”,他还看到了另一面。《〈应用文写作课〉应如何发挥教学作用》(2000年)中指出:“高远有高远的意义,通俗有通俗的妙用”;能够学成专业之长,有能力解决自己面对的现实问题,乃至有能力“济众人之急”,也是对社会“有益的贡献”(390)。与此互文足义的是,《论语导读》(2001年)中他对“立志”问题作了个性鲜明的独特阐释:孔子既景仰“圣人”理想,也推重“善人”境界,更肯定“成人”目标;其要义“乃在逐渐从过分理想化、抽象化的思维走向了生活实际”;如果学生们经过努力而“各有其优长才艺,加上礼乐修养,可许为成人了”(304)。这个“成人”的基本尺度对于师范大学的大多数学子而言,无疑是有普遍针对性而切合实际的。

徐中玉文论更有师范教育的“体贴”性(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杜成宪教授语),^②其格外体贴的也正是“困学者”。《论语》中将学习者划分为四个等级:“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徐先生的质疑焦点是:“为什么要把‘困而学之者’放在第三档?从精神上说,困而能学,更不容易。也许因‘困学’的条件很差,限制了能力的发展,影响到学习的水平,才被放进了‘又其次’的一档?但是如果困学也达到了‘学而知之者’的同样水平,放低一档我看既不必要也欠公平了”(280)。这个质疑在迄今《论语》注释文献中当属唯一。然而,徐先生进而为“最下一档”的“困而不学”者们辩护:“过去在文化专制的社会里,岂非绝大多数的人就因连生存权也难保,才被剥夺掉受教育的权利,无法求学的吗?”(280)。如果说这个辩护包含着“同情的理解”,那么它也是基于辩护者本人的家世经验。作者在十年前的《忧患深深80年——我与中国20世纪》自述有:“两个姐姐都只读完初级小学便辍学在家,给袜厂摇洋袜,挣的钱只能培植我这个男孩”(《徐中玉自选集》1-2)。

然而徐中玉本人的教育生涯却是以孔子为师范。进入新世纪之初的2001年,年近九十高龄的他依然挥笔撰成长达两万字的论文,该文题为《今天我们还能从〈论语〉择取到哪些教益——〈论语〉导读》。其中一段写道:“孔子一辈子是

‘海人不倦’，终其一生‘以求其志’、‘以达其道’的。[……]这种积极用世、尽其能力、贯彻始终的人生态度，对我国后世的志士仁人如司马迁等等有深刻的影响”（《徐中玉文论自选集》305）。这应该也是徐先生的夫子自道。

三、大学之道与《大学语文》

《徐中玉文论自选集》收入多篇与《大学语文》有关的论文。《六十多年我与本国语文关系中的随想》（1984年）写道：“这辈子与本国语文教育的关系将是很密切了”（360）。徐中玉《大学语文》创始于1980年，是恢复高考以后最早问世的“大学语文”读本，迄今已出第十修订版。^⑧新世纪以来，该读本被教育部选定为全国高校重点教材，目标是成为普通高等院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

在文艺理论学术界，徐中玉率先开拓《大学语文》研究域，是同时代学者唯一长期潜心劳役其中者。徐中玉之所以由“文论”而进入《大学语文》，潜在而根本的原因是基于古典“师范”内涵的“大学之道”。儒家经典《大学》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亲民”是“大学之道”的题中显然之义；因而徐中玉“民本”文论可谓是古典大学之道在现代的发扬。韩愈《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又可见古典“师范”之义与“大学之道”的逻辑联系。古典“大学之道”的载体首先并主要是诗文作品。因此，当代《大学语文》由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长期任教的古典文论学者徐中玉先生首创，已然启示中文“师范大学”的题中之义。这个题中之义是西语“师范教育”（“normal school”或“teacher-training”）未必有的。

徐中玉《大学语文》中的“大学之道”是以现代汉语“人文精神”为关键词的新形式表达：“现在的‘大学语文’课程，必须重视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总目标乃在提高大学生的品格素质与人文精神”（《徐中玉文论自选集》384）。其“人文精神”的主要载体也是诗文作品，“热爱祖国、为社会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些人文精神和高尚品德，可以在优秀作品中充分体悟”（384）。

徐中玉《大学语文》所录“优秀作品”大部分

选自中国古典文学。例如第九版总计89篇中，古典52篇，现代26篇，翻译11篇；其分类编排标题中的关键词依次有：仁者爱人、和而不同、胸怀天下、浩然正气、冰雪肝胆、以史为鉴、故园情深、亲和自然、诗意人生等。可见其中的语文之道是与《文心雕龙》所谓“相如好学，师范屈宋”，以及《全唐文》所录“缅维前修，诚可师范”（李克用《求言诏》）等古训相承续。

徐中玉《大学语文》也多方面吸纳了现代文化的新要素。其中作者不仅有胡适、鲁迅、施蛰存等中国作家，也包括契诃夫、马丁·路德·金、爱因斯坦等外国人物，更潜在蕴涵主编者本人语文师范生涯中的深切体验和思想结晶。后者包括《六十多年我与本国语文关系中的随想》追思的一位小学语文课老师陈唯吾，“他给我留下了终生不忘的印象”，他当年因领导农民“暴动”而被捕枪杀：

听到他已被杀害的消息时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我当时并不懂得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理想，可他是一个多么值得敬爱、佩服的老师啊！据说陈老师是从一所乡村师范毕业出来的，牺牲时只有二十岁。记忆中的这一个非常善于启发引导学生开拓思路的语文老师，还是一个不惜牺牲自己为人民献身的革命烈士的崇高形象，这使我多少年来都不能不经常反省自己的工作，总觉得距离应该达到的目标实在还很远。（354）

这段回忆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其时也是徐中玉《大学语文》的初创期。

四、中文师范与大学精神

《徐中玉文论自选集》不仅是文论，徐中玉文论思想连同其长久的中国语文师范教育生涯，有可能为研讨当代中国“大学精神”提供新启示。

一方面，徐中玉是在以“民众教育”为特征和目标的现代“师范教育”体制产生后进入学府；另一方面，徐中玉“民本”文论及其长久的师范教育生涯鲜明体现了“体贴民众”之情志。在这个意义上，徐中玉师范教育生涯首先具有“民众教育”的当代师范性。

王国维是现代中国率先译介外国教育学，率

先在师范学校任教,率先发表教育学论文,并率先出版教育学著作的人物。^⑨然而王国维当年贬斥“平凡主义教育”为“苟且主义”(14:28),“师范传习所尤苟且主义中之苟且者”(1:140)。如果说王国维当年面对的是师范教育与高等教育相脱节的现实,因而十分重视“国家最高学府”之人文教育,其对于限于职业培训的“师范传习所”的贬斥并非毫无理由,那么华东师范大学作为“我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在中国师范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意义;如果说王国维当年的贬斥还表征了他的高远期望,即以“国家最高学府”的尺度来要求“师范教育”,那么在新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中持久实践并开拓发扬中文“师范”之义的徐中玉先生,其所启示的“大学精神”也可能映衬了百年之前王国维所见、所思、所行的尺有所短。

世界公认的现代大学精神包括三要素:“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孟宪承语);该三要素的英语表述可概括为“3C”,即:Create(创造)、Character(品性)、Community(社会)(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教授语)。以此回瞻徐中玉师范生涯与文论,仅就本文前述古典文论研究一端观之:1. 其独特的“民本文论”融入了现代“民众教育”新理念,可谓有师范教育特色的“创造”。2. 其“体贴励志”切合贫寒学子的困学处境,可谓表征了师范教育工作者应有的“品性”。3. 其文论的师范对象是“一辈子诲人不倦”的孔子,其阐释孔子所言“乐之者”境界是“把知识贡献于社会人类为最大快乐”,此又可谓现代“Community”(人类共同)意义上的“社会”观。

然而徐中玉文论与师范教育生涯更有启示西方大学资源未必丰富的方面,即中国古典特有的“师范”文化及其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古典“师范”内涵区别于西方近代师范教育理念之处至少在于:1. 古典“师范”重视向文化典范学习,追求卓越(outstanding);近代“师范”关注社会大众,偏重普及教育的常规要求(normal school)。徐中玉文论在强调学习者“立志要高”的同时,体贴普通民众乃至社会底层的困学处境,表现出努力沟通融合两者的追求。2. 古典“师范”的文化背景是文道合一,因而由“文道”而要求“师道”;近代“师范”理念起源于文教分离的西方文化背景,因而“文”与“教”分属不同职业,其师范教育则一般偏

重职业培训(teacher-training)。徐中玉《大学语文》明确提出“热爱祖国、为社会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等中国特色的教书育人理念,实践并开拓了古典“师范”之义的现代化途径。3. 古典“师范”的教学对象限于人文领域,近代“师范”则包括数理化等科学专业。徐中玉由“文论”研究而进入“大学语文”领域,进而由主要对中文专业学生授课而开拓“各类专业学生”共同必修的《大学语文》课,这一课程的人文教育内涵及其普遍性授课范围,是西方大学所鲜见的。4. 古典“师范”之义早见于汉代(如杨雄《法言·学行》“师者,人之模范也”),其悠久历史表征了中国人文教育资源的丰富性,如果说其中不乏堪与西方大学资源相媲美处,那么徐中玉师范教育生涯也可能提示了西方“大学精神”资源的匮乏面。

王国维1911年为新创办的《国学丛刊》所撰序文中写道:“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14:131)。这个精辟之论通常被主要理解为现代中国学者必须具备西学素养,而较少被阐释为西方学者也理应具备必要程度的中学素养。例如国内学界鲜有提出法国巴黎高师众多“世界级”人物是否具备中学素养的问题。进入新世纪后的一个例外是,也是毕业于巴黎高师的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前来中国访问,在他与中国学者王元化座谈时坦言:“在近四十年的这种逐渐国际化过程中,缺了某种十分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中国。对此我是意识到了的,尽管我无法弥补”。^⑩

徐中玉师范生涯起始于西学兴起于中国之后,他践行并倡导的教育理想不仅包含融入了西学因素,更体现出“中学”也理应发扬光大于“西学”的自觉信念。八十年代后期他在香港大学举办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孔孟学说中的普遍性因素与中国文学的发展》为题讲演,其中指出:“正是孔孟这样的‘志士仁人’精神品质,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优良传统”(263);这种传统理应“被公认为第一流”(263),理应“依旧可作后人立身的楷模”(266),理应“在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于更广泛的范围里发扬光大”(269)。这一信念也是笔者读《徐中玉文论自选集》所获新启示所在。

注释[Notes]

①本文写成于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校庆六十周年期间。徐中玉出生于1915年1月。2009年《我的简历》自述:1929年(14岁)初中毕业后报考“高中师范科”;1932年在一所县级小学“当教师满两年”并兼任全校训育主任,“我那时还不足十八岁”。1934年考入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山大并入迁在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读完本科后继续考入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中国文学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两年毕业后留校中文系任教。1941年起先后在中山、山东、同济、沪江、复旦等中文系任教,建国初期转入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改革开放以来先后任中文系主任、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校委会副主任,上海市作家协会第四届副主席与第五届主席等。如果以1932年从无锡高中师范科毕业后任小学教师为始,则迄至2011年,其师范生涯已届八十年。参见《徐中玉文论自选集》中《我的简历》及《六十多年我与本国语文关系的感想》等篇。

②《徐中玉文论自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前此两部为《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论文自选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徐中玉自选集》(上海著名学者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

③“华东师范大学是我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从一开始就为新中国的大规模文化建设承担重要使命”,见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继承办学传统 激发文化创新活力”,《华东师范大学校报》2011年9月6日。又:“1951年10月16日,人民共和国新建的第一所师范大学在上海正式诞生,〔……〕意味着在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独立的师范大学体制的被认定”。见杜成宪 张爱勤“孟宪承与现代中国教育”,《文汇报》2011年9月12日。

④《辞海》2009年版的释义:“师范教育亦称‘教师教育’,是培养师资的专门教育。”包括中等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职业师范学校等。

⑤参见沈曦:“国外免费师范教育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07);及“国外师范专业是否实行免费教育”,《中国教育报》2007年3月19日。

⑥参见《徐中玉自选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2。又《徐中玉文论自选集》:读大学一年级时花的是“当小学教师工资的积余”;自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努力写文章投稿刊,动力之一是为“自力更生解决学费”(379),因为“自己必须设法维持第二年仍能读下去”(358)。

⑦“孟宪承教育思想〔……〕,其特点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体贴’”。见杜成宪 张爱勤“孟宪承与现代中国教育”,《文汇报》2011年9月12日。

⑧参见《东方早报》,2010年4月2日。

⑨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王国维全集》第20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王国维于1903年开始编译《教育世界》杂志,1904年在通州师范学校任教,1905年出版《教育学》(授课讲义),1906年发表《论平凡之教育主义》论文。另参见黄启兵 孔明:“王国维的高等教育思想初探”,《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4(2004)。

⑩庄国欧:“抵抗解构:解读德里达和王元化的对话”,《东方丛刊》1(2006)。又张宁:“德里达访谈”,《视界》第三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童世骏:“继承办学传统 激发文化创新活力”,《华东师范大学校报》2011年9月6日。

[Tong, Shijun. “Inheriting Educational Tradition and Boosting Cultural Innovative Vitality.”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6 Sep. 2011.]

徐中玉:《徐中玉文论自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

[Xu, Zhongyu. *Xu Zhongyu's Self-Selected Literary Essays*.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9.]

——:《徐中玉自选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

[———. *Xu Zhongyu's Self-Selected Collection*.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1999.]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

[Wang, Guowei. “Preface to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Series*.” *Collected Works of Wang Guowei*. Vol. 14.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ress and Guangzhou: Guangdong Education Press, 2010.]

——:《教育小言十二则》,《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

[———. “Twelve Entries on Education.” *Collected Works of Wang Guowei*. Vol. 14.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ress and Guangzhou: Guangdong Education Press, 2010.]

——:《论平凡之教育主义》,《王国维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

[———. “On Ordinary Education Doctrine.” *Collected Works of Wang Guowei*. Vol. 1.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ress and Guangzhou: Guangdong Education Press, 2010.]

(责任编辑:王 峰)